

#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历史演进、 实践旨归与实现路径

王鹏

东莞市行政学院,广东 东莞 523000

**摘要:**“全人类共同价值”论断的提出是遵从对人类文明规律性的把握,其本身是类本质的自觉与人类价值观的趋同,也是目标追寻、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的有机耦合。从历史的视角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进行考究,可以为全人类普遍性的价值认同的达成提供历史依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世界之问”作出科学回应。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达成需要摒弃“丛林法则”式的恶性竞争,倡导多元、多维与合作共赢的良性竞争,需要发挥其普遍性、共通性和汇融性的特性,在科学理性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在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下不断探寻其实现之路径。

**关键词:**全人类共同价值;类本质;文明冲突;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820;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4.03.002

**文章编号:**2096-9864(2024)03-0009-09

2015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明确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sup>[1]</sup>,此后围绕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成为中国外交场合的重要论题。习近平主席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论述是在遵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点上提出的,反映了全人类普遍意义的价值共识,表明了其在历史必然中应然出场的叙事缘由和坚持意识形态守正创新的叙事特征,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对于“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重大论断的阐释可以从理论内涵、逻辑关系、实践路径等不同视角进行,但不论是哪个视角都离不开它所属的历史关系。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

规定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sup>[2]</sup>。因此,对这个价值理念进行非历史或超历史的解读都是不恰当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它也“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本文拟分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历史演进、实践旨归与实现路径,探讨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全人类共同价值何以可能,旨在给出某种阐释的历史理由,以期丰富全人类共同价值理论视角的解释范畴。

##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历史演进: 类本质的自觉与人类价值观的趋同

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在类本质的认同中创造

收稿日期:2024-01-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8CMZ034)

作者简介:王鹏(1983—),男,河南省太康县人,东莞市行政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自己有价值的世界,这种类本质的认同是人类构建自己更高层次价值世界的基石,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人类社会不断向前进步,作为普遍性价值认同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逐渐达成。

### 1. 从自发到类本质的自觉

人始终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人的类本质的实现也必须是在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中展开和生成的,所以人必须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个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3][32]</sup>马克思从人的类本质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在对类本质的认同中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sup>[4]</sup>从发展的历史脉络看,不同族群的发展都沿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惯性,遵从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原则。人类早期,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族群都遵从着朴素的自然规律认识外部世界,人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人自身作为主体的存在,这时人与自然的界限是模糊的,这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有关。由于人们认识和实践的限度,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族群相互间也几乎没有交集,大多会以自我为中心,因此不同的国家产生了不同的文明形态。但是,每一种文明形态的演进都有一种内在的动力与方向,均按照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向前发展。

随着人们对外界的不断探求,各族群间的交集日益扩大,增进了相互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多民族融合的趋势明显,但这也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在古代中国,农业文明逐渐在黄河流域酝酿产生,民族间的融合也在这个区域快速推进,逐渐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以中原文化为主体、联结周边区域文化的格局。古希腊曾是一个个独立的以城市为中心连同周围的小片乡村区域构成的城邦,尽管城邦之间一般会采取闭

关排外的政策,外邦人很难取得该城邦的公民资格,但城邦间的经贸是开放的,所以这些众多的城邦间也逐渐形成了一体的文化认同。但在曾开创西方辉煌文明的古希腊人看来,人们应该追求普遍的知识,而这些知识不可能从研究变动不居的历史中获得,故他们不注重历史在时间中的变化,而往往诉诸人与自然之外永恒不变的神。这也反映了在古代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处于劣势地位,在认识世界中创造出异化于自己的神,反过来又受制于神,将人类的历史与文化归功于其恩赐。在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思想,无论在生活世界中还是在精神世界中都注重将对天的敬重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即神,如儒家的“敬天、畏天”思想、道家的“道法自然”,这些都体现在“天人合一”思想里面,无论从人与天的关系,还是从人对自身的认识来说,都是一种思想和行为的自觉。可见,每一种文明的演进都有一种内在的动力与方向,在人的活动中表现出对类本质的自觉和主动创造性,都按照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向前发展。

### 2. 从被交往到一体化趋向

到了近代,随着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人们相互间的交流交往更加频繁,这个时代通常也被称为“人的时代”。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哲学命题的提出是这个时代的重要标志。而作为主体特征的理性的觉醒,带来的是科学的兴起,这为人类社会一体化进程提供了技术基础。特别是航海技术的成熟,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推进了地区的交流,增进了文明的交融。例如,在15世纪初,中国的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曾抵达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印度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完成了人类探索世界的伟大壮举,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交流;

15、16世纪欧洲的探险家们在资本的驱动下开启了“地理大发现”之旅,真正将世界联系在一起,为人们认识世界整体提供了实践基础。

世界一体化进程是通过工业革命来强化的,“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sup>[3]194</sup>。工业革命使得资本家需要尽可能多的原材料、劳动力和广大的市场等,贪婪的本性使他们将全世界能够纳入的都纳入他们的殖民版图,地理大发现又将澳大利亚、南美洲、北美洲吞入“血盆大口”。这一时期,民族、国家间的交往不再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外交层面,而是在有意无意间、主动被动间被带入了一种世界性或全球性的交往,且随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推进,这种掠夺式的交往被不断增强。随着社会大分工的加剧,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人类社会也从相对封闭单一到开放多元。尽管在阶级社会里人的异化与被压迫性突显,但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来看,人类社会一体化趋向不会改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趋向会不断加强,并形成—个利益共同体,现实的人在这个共同体中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

### 3. 从历史到世界历史的转变

在地域性、血缘性等影响下,人们往往在不断区分“我们”与“他们”,不断地自我划界。在“我们”的概念下就包含着以自我为中心,而“他们”又以“他我”为中心,“我们”与“他们”往往会产生冲突,甚至战争。而随着交往的深入,“我们”与“他们”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彼此交集不断增大,逐渐形成了一个大的共同体。“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

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sup>[3]168</sup>人类社会不再是众多单个的个体的自我发展,而是交叉进行,共同发展,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也由各自历史向共同的世界历史发展。

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发展趋势的学说,从唯物的、实践的、历史的视角解读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必然性,这既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特征,又说明了世界历史一体化的趋势和整体发展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人类交往逐渐突破时空的局限,各民族国家之间逐渐由孤立封闭的历史形成广泛联系的世界历史,其中世界市场是其重要内在推动力。世界统一的市场会促使彼此间的密切交往,并朝跨国化发展,进而使相互间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共识,形成彼此相互认同的共同价值。就历史事实而言,人已经从总体上实现了从“人的依赖关系”转化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且向着“自由人联合体”不断迈进。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解放的学说,表达的是一种本体论的追求:把人从一切非人的或异化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而人的解放并不是某种状态,而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一过程使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范围内以经济为媒介融为一体: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另一方面,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愈发加重,全球不确定性加剧,解决这些问题客观上需要加强合作,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旨归: 从冲突分裂到合作共赢

全人类共同价值形成的实践伴随着文明冲

突。文明冲突是指不同文明间的接触与碰撞,是文化整体间的对抗,会促使一种文化形态向另一种文化形态飞跃,文明冲突不是简单的文化交流、传播、融合,而往往是相互摩擦与磨合的过程,它需要一方或者双方放弃原有的文化形态,转而接受一些新的、相异的,甚至相悖的文化形态。这既有双方对等的文化博弈,也有一种非自愿的、被迫的接受。但文明冲突的前、中、后期都伴随着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交融,这促进了人类文明与共同价值认同。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文化形态,但不同的文化形态间不是割裂的,而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sup>[3]669</sup>甚至在社会转型、战争冲突、社会更替等社会出现激烈的文化冲突时,文化间仍然会相互吸纳和融合,但新的文化认同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这期间依然会伴随着持久的冲突与摩擦。

### 1. 人类文明冲突的阶段特征和价值认同

在人类社会早期,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自然力量的强大与人类的弱小之间的矛盾在此时尤为突出和明显,这时的人们还是“半动物”的,还没有真正将自己与自己的生命活动分开。但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已不再是仅仅本能地适应自然,而是在不断尝试着改造周边生存的环境,也就是说,人们不仅以生命活动的方式存在,而且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活动,并根据自己的意识与意志进行生命活动。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人类文明从野蛮时代进入所谓的文明时代,但这时建立起来的文明社会只是对于统治阶级奴隶主而言的,而对于多数的奴隶来说是没有民主、自由可言的,

如古希腊城邦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也只是对于少数的奴隶主阶级而言的。所以,奴隶社会是少数人的富裕与多数人的贫困、少数人的自由与多数人的不自由、少数人的民主与多数人的枷锁、少数人的文明与多数人的野蛮共存的社会。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新型生产工具的出现,生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奴隶主-奴隶”变为“地主-农民”。与此同时,新的社会矛盾也伴随出现,统治阶级往往借助于宗教来麻痹被统治阶级,如西方的天主教、新教,中国古代的“儒道释”等,这一时期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信仰、规范和价值认同,但这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种文化都在不断流动改变。

人类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社会的巨大飞跃,人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也同时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也是人的价值遭受新型贬损的历史,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尽管它总是打着文明的旗号,但是带给了人们新的压榨与剥削。这里面既有对工人、农民的剥削,也包括对落后民族、落后地区的剥夺,为了获得最大利益、最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们不惜一切手段,甚至发动战争,将人类带向苦难的边缘。尽管说,随着社会向前发展,自由、平等、博爱等基本价值观得到广泛认同,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人获得了相对独立和自由,但也造成了人的严重异化。现实中,资本主义思想家们所鼓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想与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现实发生尖锐的矛盾,要想确保平等,就得限制那些有特权的人,而要人人能自由,也就必然影响所有人的平等,资产阶级所倡导的价值观只能属于资产阶级,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些都是“存在中的无”。在资产阶级主导的阶级社会里,在“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形态中,个人依附于群体,个人不具有独立性,只不

过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在资本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物”是价值核心,追逐利益是基本遵循,服务资产阶级特殊利益才是“普世价值”的真正目的,其实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和推行的强迫性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充分反映了西方国家文化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野心<sup>[5]</sup>。

## 2. “丛林法则”下的恶性竞争与价值趋向

“丛林法则”本是对自然界动植物生存规则的形象指称,作为动植物生存之道的“丛林法则”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不仅包括竞争规则,还包括了相互依存关系、扶助关系。因为自然界是多样性的,所以其生存规则也是多样性的。但实际上,人们往往将“丛林法则”简单化,将其仅仅理解为“你死我活”的生存法则,一些人还将达尔文所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原理随意扩大到经济、社会、政治、历史等领域中,使之成为一种信条。

从历史发展的整体看,“丛林法则”所倡导的竞争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必需手段,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所提倡的自由竞争。其中对物质的追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表现,但当它超出一定的限度时,就会导致人类发展系统的失衡,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异化。过度的竞争或者竞争的极端化、片面化,导致发展手段与目的的颠倒、发展目的和价值观念的缺失,人必须服从于“物”,即发展只有“事实观念”而无“价值观念”,进而导致社会的分裂与对抗,具体表现为对自然的征服、对同类的掠夺、对资源和能源的浪费与消耗,以及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等,这些成了人类发展问题和困难的源头。例如,资本家们只讲利益,不讲道德,宁可把多余的牛奶倒到河里也不发给穷人;资本主义为了原始积累和寻求市场,发动战争,对殖民地人

民进行血腥的掠夺与镇压等。这一方面促使资本快速积累,不断满足他们的物质欲望,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却使受殖民地区的民众陷入悲观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对弱势国家与地区造成重大的伤害与损失。

对“竞争-进化”理论的过度崇尚,极端的、无限度的竞争,一味地按照“丛林法则”式的竞争,导致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无限度恶性循环:人与人之间的恶性竞争——掠夺、冲突、战争,人类的相互残杀;人与自然的恶性竞争——自然的“报复”,生态的恶化。这些挤压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空间,使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播与弘扬遭遇瓶颈。但从历史发展视角看,人类社会一体化趋势不会改变,人类整体发展理念的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使合作式发展理念彰显,共同价值成为普遍共识,无度的恶性竞争快速消亡,但这个过程不是短暂的、一帆风顺的。

## 3. 文明冲突中的分裂与交融

文化冲突蕴含着分裂的力量,也同时孕育着统一的力量。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看,文化冲突可分为纵向的与横向的。纵向的文化冲突是不同时代主流价值观的相遇与对抗。旧的价值理念的解体与新的价值观的产生是同步进行的,但该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往往会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完成。一种价值观形成以后,一般会经历一个长时期的稳定期,在此期间,文化与经济、社会和谐统一,人们会对现有价值有一种自发的或自觉的认同,这种认同有助于形成共同价值取向,进而为社会发展与进步提供内在的凝聚力。而价值冲突会打破这种稳定性,动摇过去判断是非理所当然的标准和安身立命的根基,异质文化不断侵入并开始占据重要地位,人们有点不知所措,出现了认同危机,如亨廷顿所说:“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人们看

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sup>[6]</sup>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往往会出现价值认同危机,而要摆脱这种危机有赖于价值观冲突的博弈与对抗。然而在价值冲突期,传统价值文化往往会表现出对新文化的奋勇抗衡。例如,每次人类社会转型期,人们都要被迫改变原有习惯,开始时都自觉不自觉有一种内心的抵抗,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旧的价值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适应性,这时就不得不做出调整,要么不断改变自己,自觉与价值认同相适应,要么被新的价值观强行推倒。

横向的文化冲突是不同地区或民族间的价值观碰撞与对抗。一是发达国家(民族)对落后国家(民族)的入侵,强大的一方通过战争、侵占等方式将自己的价值理念强加给弱势一方,而弱势一方又不甘心被对方吞噬而进行反抗,如近代西方列强对亚非拉地区的殖民扩张。二是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民族)间的博弈,两种并行发展的不同文化,随交通、通信的发展而开始碰撞,双方势均力敌,受到对方威胁,但又彼此无法征服对方,都在努力维护自身的存在,形成僵持与对峙。三是落后国家(民族)对先进国家(民族)征服的“复归”,如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莫卧儿人,征服过南宋的蒙古人等都反过来被先进文明所征服。由此导致的复归现象恰恰是在多样性中证实了历史的统一性,在复杂性中证实了历史的规律性。价值共识不是脱离各个民族的价值而独立存在的抽象共识,而是在人类文明进步中、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中逐步形成的对某些基本价值的认可<sup>[7]</sup>。文明冲突中的分裂与交融必然包含着价值观的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在取长补短中不断地丰富价值观的时代内涵。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全球化时代到来,特别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的形

成,“丛林法则”式竞争必然会被多元的、多方面的合作发展所取代。这种合作式发展并不是不要竞争,而是倡导在合作前提下的良性竞争,以多元、多维为特征。这正成为发展的大趋势,成为共同的价值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及其践行强调各种制度、各种文化之间的包容共处、求同存异,以超越“零和博弈”的思维来彰显合作共赢的精神实质<sup>[8]</sup>。

### 三、实现路径的耦合:普遍性、共通性和汇融性的统一

从唯物史观视角出发,全人类共同价值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理性选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承载着推进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的美好愿景。但要真正达成全人类普遍的价值共识并非易事,特别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这需要发挥其普遍性、共通性和汇融性的特性,在科学理性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在科学方法论指导下不断探索其实现之路径。

#### 1.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普遍性:总体把握和整体推进

一个个历史事件、一段段历史过程组成了历史发展的整体,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类活动的能动性是统一的。人们在对历史进行考察时,如果只局限于某一个短暂的历史阶段或者某一个历史事件,那么就会将历史归为偶然性的存在,否认其必然性。当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不意味着其没有偶然性,历史的必然性中贯穿着偶然性,历史的偶然性中包含着必然性,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不存在纯粹的历史必然性或者纯粹的历史偶然性。离开社会历史必然性谈偶然性就会陷入非决定论和历史唯心主义,而离开社会历史偶然性谈

必然性也会陷入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规律并没有否定人们在现实中进行选择的主动性和可能性,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规律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性,不是既成事实,而是一种趋势。人们创造历史的过程是利益诉求驱动下的价值创造过程,每个个体的需要、动机都融入到价值创造之中。从历史的连续性来看,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人们按照自身的价值取向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体现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在看待和处理当今世界问题时必须加强系统思维,整体把握、全局谋划,从人类发展大势、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深化对话交流,避免单打独斗,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特殊利益和意识形态歧见,有利于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解放的普遍价值<sup>[9]</sup>。当然,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与认同也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文明间的不断交融,从全人类的视角看待全人类的问题,树立起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

## 2.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共通性:有的放矢和交互主体性

在社会历史领域,价值是人类社会的组织秩序与组织观念、规则的统一。关于价值的哲学思考会深化人们对真、善、美相互关系的理解,也会引导人们合理地对待社会价值导向与个人价值取向。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总离不开对真、善、美的追求,这就使得人类社会形成统一的价值尺度或价值标准成为可能,并成为内在的共同价值趋向。在历史哲学领域,一直存在着性善论与性恶论的争论,正是人们在私利的追逐中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他们又都把历史的动力归为“天意”“外在无形的力量”,而不是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但不管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应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有的放

矢,追求共同价值认同。与此同时,唯物辩证法还告诉我们,要全面地看问题,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往往以自我为中心,试图将自己的价值取向向外推广,甚至想方设法强加给他人,但他人也会将自己的价值变成更广泛的社会价值,这就造成价值冲突,进而可能导致战争。但战争又不能平息价值冲突,这就促使人们反思:仅仅从自身利益和需要出发的价值观是不是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这需要人们在交往中寻求共同的价值认同以形成正常的社会秩序与道德秩序,各个国家(民族)间也只有通过寻求价值认同不断推进相互理解、相互包容,进而寻找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共通性,这些共通性不断汇聚就会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习近平主席强调:“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sup>[10]</sup>尽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无数的文化形态,也有众多的价值取向,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有一种内在“超时空”的规律和一种永恒的价值追求,这是代表了人类历史前进方向和根本利益的价值导向。

## 3.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汇融性:求同存异和促其飞跃

世界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要在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性。价值观的特点一般是通过不同理念、不同事物的选择与取舍而显示出其价值偏好的。因此,不同文化间的价值认同会因个体的内容关联与他者之间的归属和分界问题在不同时代遇到重重阻力。中西方价值观是在两个不同的文明形态下产生的,因此两种价值形态有很大的差异。例如,西方文明的道德原则是个人先于集体,个人有权根据自己的价值利益观行事,个人的自由高于集体的利益,个人的权利要求也是政府的责任与义务,这种文

明形态往往忽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而在中国传统文明形态里,有一种以“他者”优先为特征的伦理,而非突出个体,强调对“他者”的义务和尊重。这两种文明形态的耦合需要树立求同存异的思维方式,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在这种文化之下也有着一种重要的共通性就是人类价值诉求的汇融性,这种汇融性超越政治文化的边界通过价值认同表现出来,既充分包容价值理解的多样性,又尊重价值实现路径的多元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价值观不仅对中国,也对东亚、南亚等很多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相比较而言,西方价值观是在西方文化浸染下,经过了长久的相互碰撞与交融后,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价值体系。从价值层面讲,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具有现实的普遍性,中华文明中的仁爱、和谐、天下、责任等价值也同样具有现实的普遍性,这两种普遍性之间也具有共通性,这种共通性为价值的汇融打通了渠道,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的基石。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构建是多种文化交融的过程,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sup>[11]</sup>“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sup>[12]</sup>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有中国传统价值取向,还积极吸收了西方价值理念中的民主权利、公平正义、法治意识等合理内核,是契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具有示范与引领作用,是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认同。

综上所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人类共

同价值”是基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潮流,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社会向前、向上的发展态势不会改变,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与践行亦如此,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点,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那么,一致性、持久性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认同是可以而且能够达到的。尽管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多需要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与挑战,但一些国家逆时代潮流秉持“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和战略方法,奉行单边主义、霸凌主义,把价值的道义性、公平性置之脑后,这既背离他们所宣扬的“普世价值”,更是远离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趋向,失道寡助,必将被历史所淘汰。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人类总体性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又经过亿万次实践的重复、验证而获得了其公理性,对于具体时代具体国家和个人来说,都具有普遍约束力<sup>[13]</sup>,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必将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显示出其现实性,也必将越来越广泛地成为国际共识。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5-09-29(2).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3.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8-05-05(2).
- [5] 王虎学,陈婉馨.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界定、甄别与超越[J]. 治理现代化研究,2023(1):72-79.
- [6] 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129.

[7]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普世价值”论批判文选[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136.

[8] 王永贵.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话语特性和叙事体系[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8):1-9,167.

[9] 张宏,肖会舜. 相对主义时代的价值重建:“共同价值”的道德哲学诠释[J]. 浙江社会科学, 2020(6):87-93,158.

[1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24.

[11]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92.

[1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475.

[13] 张建云.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本质区别的哲学评判:兼评理论界对“普世价值”论的批判[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4(6):1-9.

[责任编辑:毛丽娜 聂海杰]



引用格式:王鹏.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历史演进、实践旨归与实现路径[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5(3):9-17.

## 本刊数字网络传播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维普网等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其相关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